

我心目中的梁方仲先生*

——《梁方仲遗稿》序

赵德馨

五年前,承邝学兄告知,梁方仲先生的遗物中,有听课笔记、读书笔记、札记、未刊文稿、信件、案头日历记事等,他准备整理出版。我认为,这批遗物内容丰富多样,对理解梁先生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形成,他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不可或缺的;对了解 20 世纪 20—60 年代中国学术的走向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动态,有重要作用。例如,梁方仲先生 1930 年前后听陈岱孙两门课的笔记,1938 年听毛泽东讲矛盾论的笔记,1944 年听胡适讲中国思想史课的笔记,1953 年到 1955 年听陈寅恪两门课的笔记,等等,对研究这些人的思想与学术,是难得的文献。他的读书笔记,对所读之书提要钩玄。他的札记,有读书心得,有思想火花。至于《明代督抚表列》、《明代地方志综目》和多项统计表等,更是他多年艰辛劳动的心血结晶,可为后学者使用。它们很珍贵,若能出版,对学术发展是件大好事,一定会受到学界的欢迎。

两个月前,他告知遗稿已整理成册,嘱咐作序。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作为一个后学者受梁方仲先生教诲、影响与对他学术地位的认识过程,亦即我心目中梁方仲先生形象的生成过程。

1953 年 9 月初,我和周秀鸾由不同学校被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学习。周秀鸾的同事介绍她时说:“大经济史学家梁方仲的弟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梁方仲”这个名字,一个“大”字,印象至深。

1954 年 10 月间,师兄王方中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尚钺老师要他读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可中国人民大学找不到这篇文章。他请周秀鸾向梁先生借阅此文。不久,梁先生寄来了载有该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我想,尚钺老师这么重视这篇文章,它又这么难得,机会不可错失,便从周秀鸾处借来一读。由于底子薄,虽然读了两遍,还是似懂非懂。这是我第一次读梁先生的论文。读后的感觉是,经济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一门很难学好的学问,梁先生的学问真大。

1957 年冬,周秀鸾(此时已是我的内人)收到梁先生寄来的《明代粮长制度》一书。我认真地学习了,这是我第一次读梁先生的专著。读后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梁先生的《一条鞭法》,从选题到分析方法,侧重于经济方面,《明代粮长制度》则侧重于社会方面。梁先生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得心应手;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运用自如,令人衷心佩服。同时,我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像梁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快 50 岁了,为什么出版的第一本书写的是这么一个小题目?周秀鸾向我解释:第一,梁先生做学问极其严谨,不是成熟的东西不发表。第二,梁先生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他对我们(指梁先生的研究生)讲过,小题可以大做,像从一滴水中看太阳那样。我从梁先生以及其他先生的事迹中受到启示,为自己立了一个规矩,50 岁以前学习和积累知识与资料,50 岁以后再写书。我主动给出版社交书稿,都是 50 岁以后的事。

1965 年 11 月下旬,梁先生派人通知周秀鸾,他已到达武汉,住在武汉大学招待所。我们立即动身前去拜谒,那种高兴、急切的心情,至今未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令人遗憾的是,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后,梁先生谈兴很浓。他告诉我们,他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已经完成。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很高兴。当时他谈得比较多的是研究经济史学也要做实地考察,这个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从那时起,不仅是研究现代经济史中的问题,即使是研究近代经济史和古代经济史上的课题,我也尽可能地做社会调查。如我研究黄奕住,用了 6 个假期,到他出生和成长的南安,他回国定居的厦门,

[作者简介]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武汉,430073。

他投资的企业,他捐过款的学校、图书馆、医院、名胜古迹等做实地考察。又如研究楚国的货币,既到有关的博物馆去调查,还到一些银行作调查,还访问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者,收获丰厚。

1981年,复旦大学陈绍闻教授请我去审阅《中国古代经济文选》。我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看到梁先生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立即购买一册。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几千年间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户口、田地、田赋是事关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梁先生此书是用统计学方法梳理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数量的变动情况,为解说中国经济通史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对我这个以求通为一生努力目标的人来说,真是如获至宝。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若对中国经济史没有通识,如若对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的有关制度变迁与运行机制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如若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没有全盘的了解,如若没有统计学的功力,如若没有长期研究的坚韧意志,是不敢开展这项工作的。即或开展了,也很难取得这样的优秀成果。每次捧读此书,我心中就流溢出对梁先生学识与毅力的敬佩之情。1949年他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后,就为学生开设了中国经济史课程,从远古讲到清代,这标志着他在教学方面从明代经济史转向中国经济通史。这本书,在统计对象的时间上,自西汉至清末,计2100多年,不仅打破了朝代的界限,也跨越了古代、近代的界线,标志着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从断代走向贯通。它是梁先生研究中国经济通史的代表作。有人在介绍梁先生时说他是研究明代经济史的专家,这当然没错。但他又不仅是研究明代经济史的专家,还是中国经济通史专家。

从1953年到1982年,我从闻梁先生之名,读其文,学其著作,到一识荆州面,面接教言,深感幸运。

为了准备给研究生开一门有关经济史学科入门知识的课程,从1979年起到1984年,我集中精力研究经济史学科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问和怎样研究这门学问,其内涵包括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经济史学科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包含哪些分支学科,不同的分支学科应该研究哪些课题,怎样去研究,有哪些研究方法,经济史学科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出现了哪些学派,前人积累了哪些经验教训,等等。所有这些项目都与梁先生有关。从那时起,梁先生不仅是我继续学习的对象,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在此,不可能详尽地介绍每个领域中梁先生的贡献以及对我的影响,仅举两例。

我对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考察,是从中外两个方面及其互动中进行的,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史学史上。这项研究使我得以从经济史学学科成长的角度,关注各位经济史学家的贡献,也就是将梁先生与其他经济史学工作者进行比较,来看他的作用和特点。

在这项研究中,我发现中国经济史学经历过两个大的阶段,它们可以称之为萌芽阶段与成熟阶段,即孕育在中国传统史学(经、史、子、集四部之一的史学)之中的阶段与从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阶段。两个阶段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经济理论为指导,后者以现代的史学理论、经济理论为指导;前者采用中国传统范式与体裁,后者采用国际通用范式与体裁。因此,也可以将它们称之为传统型经济史学阶段和现代型经济史学阶段。从前一个阶段向后一个阶段的转变,始于19、20世纪之交,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了一批懂得现代型经济史学的专业人才,他们是以经济史学为志业的专家;由他们组成的中国经济史专业研究机构;由他们发起的、以研究经济史为主题的专业学术团体;由他们主办或编辑的经济史学专业刊物与报刊专栏;由他们撰写的经济史论著成批问世;在大学里设置由他们主讲的经济史学课程和培养经济史学专业人才的机制;由他们提出的有关经济史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他们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梁先生是上述诸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88年,在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的发言谈的就是这点体会,即就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建立过程中的功绩而言,他是现代型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周秀鸾发表了《梁方仲——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一文(载汤明棣、黄启臣主编《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又载《周秀鸾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年版),此文由周秀鸾整理,她提议署我们二人姓名,我以文本单薄短小,未予同意。我提出的对梁先生在经济史学学科发展史上这样的—一个定位,得到与会的和梁先生同辈的汤象龙、李文治先生等老—代专家的认可,也得到后学者的赞同。现在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个人数不多的群体中,像梁先生这样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从事经济史学专业,—生未曾中断、心无旁骛、终生坚持经济史学的,不超过十个人。其中,像梁先生这样成就显著,著述不仅享誉国内,且被译成外文,受到国内国际同行交口称赞的,人数就更少了。梁先生是现代型中国经济史学奠基人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经济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学派。吴承明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派偏重从经济理论来阐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力求作出计量分析。—派兼顾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可称社会经济史学派。三者也必然对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有不同观点和见解。”(参见《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实际上还有其他—些学派,如人口学派、军事学派、地理学派等。吴先生的观点获得广泛的赞同。不少同仁按此将某些经济史学专家划入不同的学派。具体到梁先生,也有人将他归于其中的某个学派。

对于中国经济史学中的学派,我在研究中得到以下三点认识。第一,划分学派首先要明确划分的标准。由于采取的标准不同,便会划出不同的学派。划分的标准可以是多样的,从而也就可以划出多样的学派。诸如:可以按参加的学术团体划分,将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的,称之为“社联派”;参加中国经济学社的,称之为“经社派”。因为,不同的学术团体有不同的宗旨。参加哪个学术团体,是学者的自愿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社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加社联的,表明认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理论。参加中国经济学社的,则是用西方经济学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理论。诸如:可以按团聚在某个专业杂志或报刊专栏划分,如团聚在《食货》杂志周围的,称之为“食货派”;团聚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杂志周围的,称之为“集刊派”。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专业杂志或报刊专栏都有其办刊或专栏的宗旨与取向。吴承明先生将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分为三大学派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划分的标准,但可以从其表述中体会其意,大概是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理论即方法)。从研究的实践看,对同—种研究对象,譬如制度,既可以采取历史学方法考证其真伪与内涵,也可以采取经济学方法分析其运行机制,还可以采取社会学方法揭示其形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此等等。据此,对于划分学派而言,相对于研究领域,方法可能更为重要。我是按研究对象区分学科,按研究方法(理论)区分学派。理论与方法在研究者身上内化为思维方式。第二,学派有其历史性。吴承明先生治学极为严谨,他划分的三大学派针对的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某些同仁在划分具体的经济史学家的派属时,对这一点有所忽略。在梁先生40年的学术生涯里,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学派有—个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存在不同的学派。第三,学派的划分有其相对性。诸如,虽然按团聚在某个专业杂志或报刊专栏划分学派是有道理的,但不能把在某个专业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的作者,都归入以它命名的学派。汤象龙先生在主持《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的同时,也在《食货》上发表文章。又如,在学派的归属上,某些学者既可以是这个学派的,也可以是那个学派的,—身二任或—身多任。梁先生就是这样的。

2008年,在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与杨祖义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梁方仲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和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会后以《学科与学派:中国经济史学的两种分类——从梁方仲的学术地位说起》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谈的就是这些体会,即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科诸学派中的地位与特点。我的认识是:“从梁先生对经济史的研究来看,他采用了多种理论与方法,其中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和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按照上引吴承明先生的分类,我以为,这三派中,梁先生都有份:他既是历史学派的,也是社会学派的,更

是经济学派的。如若要在这三派中分出个轻重或先后次序,窃以为,他首先是经济学派的,其次才是历史学派的和社会学派的。梁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中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更是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这样,不如说他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奠基人之一为好。这就是我对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史中的定位。”

经济史学科是一门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有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也就是独立的思维方式。为了写好《梁方仲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一文,我先探索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一般特征是怎样的,其成果是《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养成》一文(提交给2008年7月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讨论,载拙著《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35页)。我后来研究梁先生思维方式的特征,发现梁先生的思维方式与经济史学科思维方式的特征相符,他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

参加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聆听方家的发言,学习与会者的大作,我的眼界大开。会后,读了刘志伟教授编的《梁方仲文集》以及承邝学兄写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与《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无悔是书生〉续篇》书稿等,使我对梁先生取得成就的原因,有了比较全面的和具体的了解。在诸多原因中,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是以下四点。

一、天资聪颖。少年时期,现在留下的有十岁左右读私塾的作业,在英文方面有译文(“美国迈德兰原著、番禺梁方仲翻译”的《鲁兰小传》);在中文方面,有诗词。其近体诗合乎格律,且初露善于用典的才能。青年时期,14岁转入新式教育。18岁以高中一年级的学历,考入清华大学。这就是说,他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业。成年时期,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1949年,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952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对于这些不同学科和不同岗位,他都能胜任,且皆能服众。他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和国外同行所赞赏。王则柯先生在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一书时,说梁先生是岭南才子,我同意,我还要说他是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才子。

二、异常勤奋。这只要看看《梁方仲文集》和《梁方仲遗稿》便能明白。这两部书中的文字,是他于20世纪20—60年代期间写下的。这还不是他在这期间所写文字的全部。在他的“读书、研究、授业、交友”四件大事中,写又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特别值得提及和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身处逆境、条件恶劣、又患重病的时期,仍笔耕不辍。

三、谦虚好学。《梁方仲遗稿》中的两份笔记,即1944年听胡适讲中国思想史课的笔记和1953年10月至1955年6月听陈寅恪讲两门课的笔记,是他的这一品格的生动证据。要知道,1944年梁先生已是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他的专业是经济史学,其时研究任务又很重,他却挤出时间去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课。1953年至1955年,梁先生已40多岁,是二级教授,与陈寅恪被列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古代史“八大教授”之中,却按时到陈寅恪先生家里听他讲课,一听就是两年、四个学期,坚持听完两门课。这两门课也不属于经济史专业知识。可见,他去听这些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增长专业知识,而是求新知,进一步扩大学识领域,学习他人的方法,以促进自己的创新。从他听课笔记的工整可以看出他的认真态度。这种年龄,这种身份,听这样的课,还这样认真,如此情景,历史上少见,也可能是绝无仅有。先天聪颖,后天勤奋、谦虚好学,是以梁先生博学。

四、职业选得好,甘坐冷板凳。梁先生以经济史学为志业,能充分发挥其所长。因为经济史学的特点是涉及面极广,是多学科交流的平台,只有博学者才能把它治好。从另一方面说,有梁先生这类聪颖、好学、勤奋、谦虚、博学的人以经济史学为志业,是经济史学的大幸。梁先生的性格耿直忠厚,追求独立人格,平等自由,独立思考。若入官场,可能处处碰壁。1946年年底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工作时,在代表团内部的一次讨论中,梁先生对一位代表关于财政方面的意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被这位代表训斥为“自作聪明”“不遵照命令办事”,即是明证。他自幼不愿加官

(嘉官乃其谐音)晋爵,及长,力避政党关系(1944年去美国考察前填写履历表时,在党派关系栏坚持空白,不填一字,就是例子)。这样一来,他便能集中精力于做经济史学问。梁先生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世界仅有的大型历史统计书”(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语),“数百年后还有人要参考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语)。此项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完成于60年代前期,历时30多年。如若梁先生不能集中精力做事,这样的成果是出不来的。

梁先生取得成就的原因中,有的是可以学而且是必须学的,有的(如天赋)是无法学或学不到的。

从1953年至2018年的56年间,通过学习与研究,我心目中的梁先生的形象越来越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2018年9月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高超群)

《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 (1939—1949)》与《抗战外援》简介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要坚持抗战,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军力。在当时,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军阀混战乱局步入稳步发展之路,民族工商业及金融银行业在外资的影响下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迹象。但国力并不足以支持同强大的日本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正面战争,突出表现为政府及国民均没有足够的积累,尤其是在财力上,毕竟,战争打的就是钱。国民政府因此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筹集抗战资金,国内向居民借钱、国外向外国政府寻求支援,也是借钱。

国内的借钱方式,从最初的发行公债到后来越发依赖于直接印钞,最终导致了通胀的失控。在抗战胜利后,通胀问题并没有如期解决,反而因国内战事呈金融崩溃之势。国民政府的决策者希望通过金圆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反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国外援助,则主要来自于苏联、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些援助有军事装备、参战部队和人员培训,更重要的是资金援助。没有这些援助,中国的抗战不可能坚持到最后,没有这些援助,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会更严重,国内通过印钞从民间筹资的方式也无法持续。

张嘉璈先生的《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该书英文原版于1958年由麻省理工出版社出版,2018年于杰将其翻译为中文,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和阿瑟·N·杨格先生的《抗战外援》(该书英文原版于196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由李雯雯译、于杰校为中文,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别就上述的国内筹资和争取外援两个方面,全景地记录了当时的过程。

张嘉璈先生是中国现代银行之父、中国银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灵魂人物,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铁道及交通部长,战后担任东北经济委主任,后接手中信银行总裁,是公认的民国时期金融专家。他利用自己留存和整理的资料,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抗战时期国内的财政金融情况,并总结了当下仍有借鉴意义的教训。

杨格先生是美国财政专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于1929—1947年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顾问,对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运行、1935年法币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国方案的起草者。他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抗战期间代表国民政府斡旋美国援助。本书正是他本人基于其个人经历对这一过程的全面回顾。

两位亲历者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角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使得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金融生态,这不只对历史认知不可或缺、难以替代,对认知当下的中美关系、分析战后货币体系以及人民币同美元的关系,都有很好的帮助。(于杰)